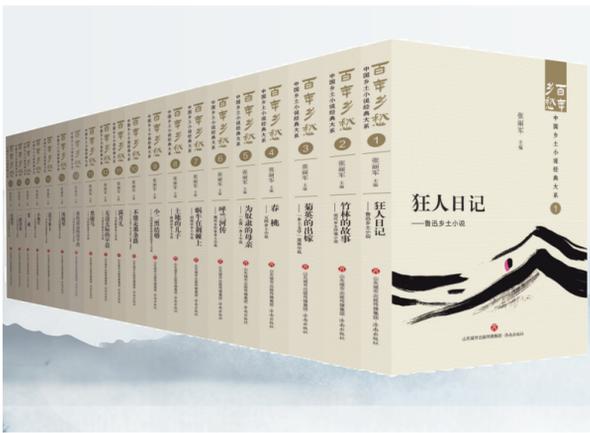


记录百年中国乡愁 传承千年根性文化

——编选《百年乡愁：中国乡土小说经典大系》过程中的思索

□张丽军



“ 新时代山乡巨变文学书写需要建构新的叙述主题、新的审美形式、新的人物形象。我们在像前辈作家一样深入生活一线的同时，也要学习以往的经典，从建构新时代新文学经典的历史使命和精神高度来思考和书写，在历史深度、文化深度、思想深度、人物深度和语言深度上下功夫、做文章，传承和创新千年中国乡土文化 ”

面对急剧迅猛的乡土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高科技化浪潮，我们惊讶地发现，曾被认为千年不变、“帝力于我何有哉”的中国乡村根性文化正面临着根源深处的整体性危机。“谁人故乡不沦陷？”千百年来，孕育和滋养乡土中国文化、文明的乡村及其根性文化正加速消逝，甚至被连根拔起。这不仅是乡土中国城市化、现代化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全球化、人类性的整体危机。早在1948年，中国学者费孝通就在《乡土重建》中提出传统的乡土社会所面临的现代性失血危机，进而提出了“乡土重建”的深邃思考。20世纪6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也关注到，在工业文明入口处，数十亿农民向何处的问题。显然，在21世纪的今天，思考乡村、乡土、农业、农民乃至整体性人类向何处去的问题，显得无比重要而迫切。

百年乡土中国心灵史的文学路线图

作为一个从事乡土文学研究20多年的研究者，我在苦苦思考：中国乡土文学向何处去？乡土中国社会向何处去？乡土中国农民向何处去？新时代乡村如何振兴？我突然意识到，既然看不清去处，何不回顾自己的来路？未来的道路，并不是冥思苦想来的，而是从过去的来路发展而来。历史的来路，决定了我们未来的去处，即未来的去处正蕴藏在历史来路之中。这让我重新思考百年中国乡土文学，重新回顾晚清以来中国仁人志士的文化选择和文学审美思考，乃至从更远的历史、文学中寻找智慧和启示。

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思考中，我与济南出版社不谋而合，立志从众多乡土中国文学中选编一套《百年乡愁：中国乡土小说经典大系》，来为21世纪的中国青年提供一个关于百年乡土中国心灵史的文学路线图，慰藉那些因完整意义的乡村世界逐渐被挤压、削弱而无从获得纯粹乡土中国体验的读者。此外，从中汲取智慧和灵感，更好地推进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也是编选这套丛书的目的之一。在编选过程中，田振华、李君等团队成员参与了全过程工作，还有很多同学参与了编校工作。在具体编撰过程中，还得到了许多作家与学者的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因为入选这套“大系”的作品跨越百年之久，在文字、标点等方面，我们在充分尊重作家初版本的基础上，依据现代语言文字规范统一做了修订。

简单归纳，《百年乡愁：中国乡土小说经典大系》中

所选取的作品，体现以下特点：

一是强烈的经典意识。文学、文化的传承与经典的建构是由一个个经典化的环节与步骤完成的。从古代文学的“选本”，到20世纪中国新文学大系，在中国文学经典化进程中，“选本”文化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乃至核心的作用，为经典化提供了不同时代不断接续的核心动力源。这套“大系”以在现当代文学史中具有影响的作家作品为选编标准，力图使“大系”具有展现乡土现代化发展史的重要功能，鲜活呈现中华民族的百年心灵史。

二是浓郁的地方气息。乡土文学是最接地气的文学，是“土气息、泥滋味”的文学，是由不同地域文化孕育、滋养的文学，又是最能显现和表达乡土中国各个地方独特文化的审美形态的文学。这套“大系”就是百年中国各地民俗文化最具有文学性的表达。齐鲁、燕赵、三秦、三晋、江南、东北、西北、岭南等不同地域的文化在这套“大系”中得到了较完整的展现。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这套“大系”既是一部百年中国民俗文化史，也是一部精彩的地方文化志。

三是典雅的审美意识。文学是审美的艺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学性、审美性是文学的自然属性。文学应该是美的，是诗，是生命舒展的自由吟唱。正是在这个审美维度上，我们来选编百年乡土中国小说，让读者、研究者在美的文字诗意的流动中获得对千年中国乡村根性文化之美的感悟，从而思考人与自然、人与大地、人与世界的精神建构问题。因此，这套“大系”是“乡土中国的抒情诗”，是千年乡土中国根性文化的当代吟唱，凝聚着深厚的乡土生命体验、文化乡愁。

从更深层、更宽广的角度理解和思考山乡巨变

乡愁是感伤的，是一种甜蜜优美的感伤。不是每个人都有乡愁的。乡愁是一种深厚的文化情怀，是对大地、故乡、世界的一种深刻的生命眷恋。而《百年乡愁：中国乡土小说经典大系》就是让我们这些具有乡土中国完整经验的最后一代人，以文化传承的方式，把这种纯粹、完整、具有审美意义的文化乡愁，更集中地传递给21世纪中国青年，乃至未来的中国青年。我们曾有过这样一种乡土生活，这样一种乡村根性文化——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根基，我们的精神基因，它蕴含未来的路

径和种种可能性。

我们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而我想说的是，越是地方的，越是中国的，也越是世界的。中华文化是一个整体，是由一个个具有地方文化特性的地域文化组成的，是千百年来文化交融凝聚而成的。地方性文化的丰富多样，恰恰是中华文化的活力与魅力所在。《百年乡愁：中国乡土小说经典大系》就具有鲜明的、浓郁的地方性文化特征，不同地域的读者可以从读到自己家乡的影子，并由一个个乡土文化而建立起丰富、感性、美美与共的中华文化世界。所以这套“大系”适合研究乡土文学的学者、学生阅读，也适合对中华文化、地域文化感兴趣的读者阅读。事实上，这套“大系”对于世界各国读者而言，是理解和思考千年中国根性文化、百年中国社会变迁的文学读本。

在今天，乡村振兴的实践正在推进，关于乡村新变的大写方兴未艾。山乡巨变是一个世界性、全球化的时代大主题，需要有一种世界性的审美视域，需要有比较文学的叙述视野，从更深层、更宽广的角度理解和思考具有某种人类性的时代巨变，建构一种从个体、群体、地域、民族到世界相融通的文学经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百年乡愁：中国乡土小说经典大系》为新时代乡土文学发展提供了来自历史深处的精神启示和路径指引。具体说来，新时代乡土文学创作可在以下几个领域发力：一是推进“新时代乡村志”的文学历史书写和非虚构书写。二是呈现地方民俗、民风、地方名人的文学书写，以此来建构乡土民间史、民俗史、地方名人史，滋养地方文化。三是书写山乡巨变的“新人、新故事、新情感”。“新时代新农民”是新乡巨变书写的核心所在。而借助众多的“新人书写”，就可以逐渐架构出一个大时代的人文景观与精神风貌。

新时代在呼唤着描绘新山乡巨变的新经典、新农民、新农村。新时代山乡巨变文学书写需要建构新的叙述主题、新的审美形式、新的人物形象。这是新时代对文学的召唤和期待。我们在像前辈作家一样深入生活一线的同时，也要学习以往的经典，从建构新时代新文学经典的历史使命和精神高度来思考和书写，在历史深度、文化深度、思想深度、人物深度和语言深度上下功夫、做文章，传承和创新千年中国乡土文化。而这正是《百年乡愁：中国乡土小说经典大系》编撰的意义和主旨所在。

（作者系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执着于将城市历史小说化

——从《万福》《同乐街》看吴君的城市题材书写

□西 篱

我们身处其中的城市空间进行了艺术的表达。在她温和细致的笔触之下，社会变迁与普通人的成长融合起来了。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在作品的背后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深入城市脉动、把握大时代变迁、展现新兴城市文化风貌、还原因人性复杂而显得五彩斑斓的世俗生活的能力和野心，令人吃惊，也让我们对她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吴君的作品全部取材于现实生活，表现了市民阶层的生活变迁史和精神变迁史，反映他们的生活愿望，潜笔于社会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物质现实与个体精神的错位，力图将每一个人的微观历史合成时代演变的宏观历史。

面对主题性的创作，作家必须要牢牢把握作品中观念与主题的一致性，甚至在语言表达上也要追求尽可能贴近生活的语言风格。这类创作，其实也是对作家的挑选和考验。在叙述上，吴君以朴素至简为策略。其小说的语言格外平实，开篇就是这样：“同乐街道前身是同乐村，位于深圳的西北角。”“万福人和香港人一样，称呼家为屋企。”

她的书，前面都有人物表，甚至有人物关系图、生活地图，力图让读者更好地开启阅读。等读者进入了文本，才会慢慢悟到，她要带大家去的地方，不只是宝安机场附近的万福社区，不只是同乐街的街面，而是要深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看清生存在深圳这座大都市里的人们的心灵和命运，分享作家自己作为感受者和观察者，对笔下人物的欣赏、热爱和批判。有评论家说吴君是一位对时代环境中的现实世界具有深刻穿透力、省察力，有人道主义情怀，具有鲜明审美追求的现实主义作家。我很认同这个评价。

吴君的创作还体现出一种与生活同步的即时性。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非凡的能力。城市化的步伐太快，人们普遍地心怀“城市之累”，麻木和疲惫也逐渐成为都市人精神面貌之一。而吴君却保持着最新最快

的感知力，她的思维系统迅速地自外部环境收集信息并及时作出创作上的响应。与此同时，她还保持了具有深度的思考和准确客观的判断。这是很多作家难以做到的。我们往往需要积淀，需要与现实拉开距离才能有思考和呈现。我想，或许是因为她曾经是媒体人，有着敏锐和准确判断的个人素质和形象化呈现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与高速发展的国际大都市深圳，有着气质上的天然吻合。

以丰富的生活细节支持故事延伸，以形形色色的人物语言和行为来呈现他们跟随环境变化而出现的不同的精神状态，这是吴君特别擅长的。她不动声色地讲述，常常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人物的复杂心理状态，尤其是当他们在漫长的生活日常中陷入迷途时，就如《万福》中潘家的那些人、《同乐街》中的钉子户陈有光。他们都是我们身边的人，而那一日复一日在害怕改变和渴望改变的矛盾交织中流逝的时光，也仿佛就是我们的时光。

吴君通过她笔下的人物和事件，讲述深圳这座城市的发育过程及其真实的状态。在发展的背后，在历史的细节中，有阵痛，有迷乱，有对立。凡是社会转型期，新与旧的对立总是最为突出甚至是十分尖锐的矛盾。无论是体制、秩序、家庭，都经历了旧的破碎和新的重建，“陈有光们”的心理都经历了突变，也经历了精神的重建。

吴君的作品已经呈现出一种既优雅又理性、既梦幻又脚踏实地、既细腻又宏大的迷人的气质。有评论家说，吴君的小说人物和故事都太“实”了，如果能够再空灵些或更有飞翔感，小说的面貌可能会大不相同。但我始终觉得这只是吴君创作生涯里的一个阶段。

我对吴君的创作充满了期待，对她的文学品质充满信心。她还可以上升，还可以更自我、更深刻、更犀利、更有力量。那是我期待的真正的吴君。

（作者系广东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

纪念

2019年8月间，《世界文学》主编高兴专程到郑州来和我们一起商议“田中禾文学创作60年暨《同石斋礼记》新书研讨会”一事。经过三个月的精心准备，是年11月下旬，研讨会在郑州如期举行。会议当天，陈众议、贺绍俊、王彬彬、张清华、高兴、陈东捷、宗仁发、沈卫威、徐兆寿、田原、程士庆、朱燕玲、何言宏、王守国、孙先科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以及《人民文学》《花城》《作家》等学术机构、文学期刊的专家学者、编辑家以及河南本土的作家、评论家共90多人齐聚一堂，从不同的切入点，对田中禾从1959年5月出版长诗《仙丹花》至2019年的60年间的文学创作成就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一晃，四年过去。2023年7月25日，田中禾先生离开了我们。在这些日子里，我的记忆时常回到那些与先生相关的日子。那次研讨会，对田先生的文学生涯来说，是值得重笔一书的事件。研讨会开幕的当天下午，主持会议的高兴让我首先发言。其实，在会议之前我写过《田中禾先生的文学风雨路》一文，将其60年的文学创作生涯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59年至1979年，这可以算是他的酝酿、试笔期。第二个阶段是1980年至1994年，这个阶段田中禾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其中以荣获1985—1986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五月》和中篇小说《轰炸》、长篇小说《匪首》为代表。这个时期的作品多以故乡为背景，以个人情感为题材。独特的地域文化，真切的乡土气息，以及对人性的关怀，构成了他这一时期小说的叙事特色。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在《诺返德的小说》《姐姐的村庄》等为数不多的中短篇小说里，田中禾除保留着第一阶段的艺术追求外，主要是在结构形式和叙事方法上自觉地进行了各种探索和实践，融入了强烈的现代意识。第四个阶段是2010年至2019年，以长篇小说《父亲和她们》《十七岁》《模糊》以及四卷《同石斋礼记》的散文、随笔为代表。特别是三部长篇小说，均以新颖的叙事手法和娴熟叙事语言，深刻反思自我，思考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和命运，形象地展现了中国人在20世纪的心路历程，代表着他在创作上的最高成就。

我和田中禾先生是忘年交。在信阳鸡公山，我们两家曾同住在一幢楼里，一个锅里搅勺子好几年。所以，他的许多作品，我是最早的读者。不光是他后期的创作，他前期的重要作品，我也都研读过。我在研讨会上大致说了如下几个与其作品相关的话题。

第一是用生命书写。小说的本质是虚构，但无论怎样虚构，都与小说家的个人亲身经历和认知是密不可分的。生活的亲历是命运，生与死都迎面而来，无法躲避。田中禾的写作是对命运的思考和认知，这从《父亲和她们》里可以得到清晰的印证，他写的就是自己的家族在历史中的命运。在《十七岁》里，父亲过世以后，母亲独自撑着家中的天，小说中的“我”以孩子的目光，小心翼翼地领悟母亲在困难中的智慧、坚韧和善良。还有《模糊》里的二哥，也是以自己的亲人为原型：二哥、母亲以及整个家庭，与这个家庭相关的人物等等。所以，田中禾写的都是自己命运里经历的东西，也就是说，田中禾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写作的。

第二是人物的典型性和深刻性。我们应该注意到，《父亲和她们》里的马文昌和《模糊》里的章明都是热血知识分子，但又是被改造的对象。一个人的命运在历史的巨浪里无法左右自己。而马文昌与章明的悲剧不在于，他们的被改造不是来自时世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还来自传统中一种可怕的“集体无意识”，就像权力意识渗透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一样，《父亲和她们》与《模糊》中，传统中的习惯势力也渗透在我们历史进程中的每一刻。

第三是清醒的文体意识。田中禾是一位具有文体意识的作家，我们从他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匪首》是通过一个家庭的三兄弟、一个女性来再现我们民族的精神意识。《父亲和她们》围绕父亲、母亲等人的线索展开叙事，除此之外还有“我”这条暗线，正是这条暗线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叙事纲目，把另外几条叙事线结合起来。在这样的叙事文本里，到处充满路径，不同的路径各具意义。《模糊》也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新疆寄过来的书稿，书稿内容是关于二哥的；二是“我”到新疆寻找已经失踪多年的二哥。小说通过二哥相关联的四个女性等众多人物，来讲述一个热血青年的悲剧命运。在写作中，田中禾强调文学的创造性，并坚持个体立场与批判意识，基于对中国历史和当代生活的思考而赋予作品深刻的思想性，在文学创作中对叙事语言、小说结构坚持不懈地进行探索和实践。这些因素使他成为一位难得的具有文体意识的作家。

记得那次研讨会后，《文艺报》《文学报》《中华读书报》与众多的网络平台都作了报道。会后我着手编选《田中禾文学创作60年论文集》，思绪一次又一次回到会议的情景里去。记得乔叶、陈峻峰、汗漫等都在发言中提到了田中禾在文学创作上对他们的关照与引导。“田中禾对于文学的庄重态度，对于处于喧哗和浮躁中的这一代人来说具有启示意义。”汗漫这句话我非常认同，因为我本人对此也感触颇深。

我初出道时还在故乡的一所小学里任教，从那时起田中禾先生就开始关注我。我们最初的一次关于文学的通信发表在《文学自由谈》上，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事情。田中禾后来出任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时主管文学创作，由他出面组建河南文学院，把我和行者、李洱从基层调进来搞专业创作。田中禾提携前辈不光是文学观念上的言传身教，还体现在工作实绩上。王剑冰在研讨会上说：“为能办好《散文选刊》，我们是经常在一起切磋、探讨，细致到无法细致……他管着好多个部门，但是对于《散文选刊》的改革，他常常是跟我一起谋划。他说，‘要把《散文选刊》打造成中国散文的风向标’。”田中禾先生为文学事业操碎了心，而且那种尖锐性、先锋性、前瞻性让人敬佩。”

如果说汗漫说的是田中禾作品的文学品格，那么王剑冰说的就是田中禾的人格魅力。我和田先生这些年的交往中，感触最深的是从他身上时常流露出的傲骨——无论是为文还是为人。我们都知道田中禾原名张其华，1941年出生于河南省唐河县一个商人家庭。他三岁失去父亲，连年的战乱在他的童年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20岁的时候从兰州大学三年级退学立志成为一名作家，在随后的20年里在郑州郊区、信阳平桥、南阳老家尝遍人间的酸甜苦辣。他的傲骨，是一个人在面对现实种种挑战时始终保持自我生命的尊严。田中禾先生逝世后，家人遵照其生前遗愿不举行任何告别和悼念仪式，不举办任何纪念会和追思会，这仍是他傲骨的一种具体体现。

田中禾在2019年11月27日《中华读书报》发表的访谈《没有人强迫给你的大脑植入芯片》中，说透了其文学精神产生的缘由：不媚俗、不逢场作戏、不逢迎权势、不为名利所诱惑，无论何时何地，他都是一个能发出自己声音的人。“精神自由”和“独立人格”构成了田中禾的文学精神。布罗茨基说：“无视文学倡导的准则而过的生活，是卑贱的，也是无价值的。”可以说，在82年的生命历程中，田中禾先生用了64年的文学创作实践，不断提炼自己的精神生活。这就是我们今天来纪念他的理由。

（作者系河南作家）

一位具有傲骨和探索精神的作家

——纪念田中禾先生 □墨白



田中禾部分作品



文学史中，城市生活一直是作家们描绘的对象。对于深圳作家而言，城市文学书写更是不胜枚举。这里想关注的是吴君的《万福》和《同乐街》。《万福》讲述了与深圳、香港两个城市休戚相关的深圳万福村阿慧和陈水英两个家庭三代人40年的往事。其间，城市与人都经历了漫长的变化，城市的历史与个体的历史融合一起。《同乐街》讲述深圳一个社区40年的变迁，在社会历史的发展当中，人的命运与城市的变迁互相映照。

一直以来，吴君写作的观点聚焦于深圳。在反映改革开放丰硕成果的作品中，吴君的小说有着诚恳和细腻的质地。她以对“城市化”进程的刻写为己任，从审美的角度展示对城市生活的全新感受的同时，也深刻解读了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她说：“我和深圳的故事说不完。我不认为这个特别的城市会带来一成不变的人和故事，所以我从来没有题材匮乏的焦虑。”

吴君身处都市生活之中，像南方的榕树一样，每一条根须都在汲取生活的养分，由此奠定她厚实的创作资源基础，并开启她考察与思索的漫漫长路。深耕20多年，她一直在做把城市历史小说化的工作，为读者奉献了一部又一部讲述都市变迁和人心状况的作品。

吴君的小说在艺术表现上既借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也适当地采取了自然主义、现代主义的艺术技法，最大化地开掘创作资源。无论是《万福》还是《同乐街》，我们都能看到作家对城市与人的关系、对历史积淀和现实发展的关系，有着深刻的思考。在这方面，她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社会学的研究范本。吴君在研究和关注城市人类生存境遇的同时，对